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目录

同舟共济迎解放……杨云涛（1）
阎锡山二三事……雁北老朽（16）
阎锡山与“九·一八”事变的微妙关系……宣绍文（26）

绵阳市液压机械厂今昔……陈友德（35）
川西北第一公园……刘天祥（47）

绵阳市农业行政机构的演进……
……雷少钦　申相坤　冯绵寿（50）
解放前绵阳县农业推广所与农村合作事业……冯绵寿（57）
解放前绵阳迎春打春习俗……冯绵寿（62）
忆绵阳农业经济的起落……杨朝俊（67）
科技进步与农业生产发展
——忆绵阳市中区农业生产发展情况……雷少钦（71）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徐举百（76）
绵阳市中区实现提灌、加工、照明电气化纪实
……邹　鹏（89）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水稻生产不断发展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水稻生产发展纪略
……梁兴鉴（96）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水稻品种演变概况……张登秀（106）
十年来绵阳小麦品种的选育与推广……邱　尧（110）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农业复种改制情况……罗昌全（111）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治纪略
……刘万海（115）
绵阳市中区土壤、肥料和农作物栽培情况…王跃华（119）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生猪生产发展情况……李庆舜（127）
九年来绵阳市中区蔬菜生产的新发展…李兴忆　赖燊基（133）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林业建设事业发展概况…康年顺（135）
建国以来绵阳市中区花生生产的发展情况…田正贵（146）
绵阳水果生产的发展史……田正玉（149）
绵阳市中区西瓜生产的发展情况……田正贵（157）
绵阳市中区发展沼气纪实……谢启鹏（161）
绵阳市中区沼气池池型技术发展情况……雷少钦（166）
小资料：
绵阳半个世纪以来的四次大水灾
解放以来绵阳发生的三次大旱灾

同舟共济迎解放

杨云涛

新中国成立已经41年了。我虽然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肩战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却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今回想起来，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现就记忆所及，就其荦荦数端，简述如次。由于年代久远，记述或有差错，恭请有关同志订正、批评。

一、维护地下党

1949年8月的一天，民革成员袁寿山、夏奇峰从成都回绵竹，顺便到绵阳看望民革成员邓伯诚。邓当时任川康民食供应处绵阳办事处专员，特设宴款待他们，并邀我作陪。席间我向袁、夏询问解放战争进展情况及成都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细声地告诉我，敌人更加疯狂，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党人王干青等被捕了。我进一步问在什么地方被捕的，他们说在慈惠堂火柴厂，社会上都还不知道。听后，我非常吃惊。我和王干青是老熟人。1937年经常在成都上半节巷3号张秀熟住处与他见面。我也知道张秀熟是王干青的入党介绍人，1941年王干青在绵竹老家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发动了几次较大的群众斗争。身份暴露了，绵竹县府要逮捕他。1941年夏天，他回到成都，党组织为了掩护他，通过关系把

他安排到成都慈惠堂培根火柴厂任厂长兼孤老院院长。另外还有几位中共党员在慈惠堂工作。当时成都慈惠堂规模很大，负责人是张澜先生。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同时我也知道当时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民革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有的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两个民主党派，彼此互通情报，这个消息是真实可靠的。我暗自想道：我必须尽快向地下党负责同志王朴庵汇报。但王是否在绵阳？还不知道。我虽然知道绵阳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李英可能住在绵阳东街他的一位熟人家里，周启亚住在绵师附小。但这两处我是不能去的，非万不得已，是不能同他们联系的。这是地下党非常严格的纪律。这使我很着急，我又想这项信息的传递，实在不能耽误，只有设法去找王。我知道王到绵阳，常在北门外一带活动，我就立刻冒险到北门外去找。凑巧，在北门外"华北食堂"附近街上行人中果然见到他了。我高呼："汪学诚（他的化名）！"他见我喊他，有些吃惊，便走过来低声问："怎么跑来找我？快回去！我随后就来。"我赶忙回家，一会儿他就来了。我告诉他王干青被捕的消息。他详细询问了情况，我们仔细分析了可靠性后，他就匆匆走了。事后听说，当时地下党决定派张秀熟和其他同志去成都作省主席王陵基左右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但王陵基反动成性，至死不悟。同时国民党一些死硬派军政要员、特务土匪头子云集成都，无恶不作，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王干青同志被捕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王朴庵同志立即作出决定，派蹇溶去平武传达停止去成都的决定，并通知张秀熟迅即转移乡下暂避。张秀熟等同志因此幸免于难。为党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记得1948年4月初，一天下午突然有一位40来岁的妇女到绵阳文庙街树德小学我家来找我。自称名黄鹤影，是成都市立女中教务主任，共产党员。由于身份暴露，遭受敌特追捕，仓促离蓉来绵的。是张秀熟告诉她的地址，希望能在我处得到帮助，设法送她到重庆去。我们一方面热情地安排她在我家住下，说树德小学房舍宽敞，文庙街很清静，这里很少人来，掩护几个同志是没问题的。另方面劝慰她不必着急。她在我家住了几天，每天帮助我妻子做些家务事。我们研究经三台、遂宁去重庆，这条路线比较安全，同时遂宁若有熟人，也可能找到组织，我就托绵阳商人张东海、倪震华找了去遂宁的货车，说是一个亲戚要去遂宁探亲。车找好后，一天早晨，我和妻子送她上车。一个月以后，她从重庆来信说，已平安到"家"，感谢我们对她的帮助。

还记得1949年深秋，有一天王朴庵来我家谈及川东方面解放军向重庆进军迅速。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即可从合川溯嘉江而上，经遂宁、三台直插绵阳。而胡宗南的大部队尚未全部集中绵阳、成都，这样就可能把胡宗南军队截为两节，形不成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包围并歼灭胡军于成都附近的局势。因此，他必须去三台、遂宁等地联系并部署工作。他离绵时，还研究布置了绵阳迎接解放的一些工作，并告诉我，必要时李英等同志会与我联系。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作垂死挣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疯狂迫害、杀戮，王朴庵同志的工作处于十分危险之中。我见他所带防身武器为旧式驳壳枪，既笨重不便携带，又很易被人发觉，我就毅然地把我心爱的红星牌小手枪赠送给他。这支小手枪是1949年初，我托崔实君向国民党汪韵廉

师长购买的，是法国造，小巧精致，有三个弹仓，配备50发子弹，可连发10响，用一个领夹式的皮夹佩带身上，取用方便，又不易为人察觉，是一件很好的防身武器。

我记得还有一件不寻常的事。1937年的一天，我堂兄本光法师带了一个徒弟法名叫景钟的人到成都中纱帽街我家来玩。此后，景钟经常在我家食宿。那时，他只有十六七岁，人极聪慧，在本光的教导下，他读了不少书，能作旧体诗。我觉得年轻人出家可惜，就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阅读，鼓励他面向光明，到延安去学习奋斗。半年后他有了觉悟，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去。通过张秀熟介绍，于1938年初，我给他买了衣物，备足路费，同一批进步青年，有组织地奔向延安去了。他到延安以后，还经常给我写信，有时也给他买几元钱的邮票寄去，作他的零花钱。因为当时四川与延安不通汇，不能寄钱，只有邮票在延安可以当钱使用。日后国共关系恶化，与延安不再通邮，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了。1951年我到成都，会见张秀熟，他说："白迈来信问候你"我问："白迈是谁？"。他说："就是你让我介绍去延安的小和尚景钟！"我问："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秀熟说："他现在住广州，是国家对外贸易局的负责干部。"听后我觉得我能帮助他从出世到入世，走上党指引的革命道路，深感欣慰。

二、展开统战工作

1948年底，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遭受惨败，长春、沈阳、郑州、济南相继解放，北平已被解放军围困。国民党军已无斗志，解放全中国看来很快了。有一天，王朴庵分析形势谈到这些问题，对我说，要宣传党的政策，一方面争取

联络一批开明的人，另方面要分化瓦解敌人，展开反蒋统一战线工作，保护绵阳一切设施不受破坏，以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我经过深思熟虑向地下党提出了团结争取旧军政人员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名单，以王石生、李国勋、彭时雨、刘职侯等人为骨干开展活动，逐步扩大。我还在我家里介绍王朴庵和王石生见过面。1949年下半年王石生在绵阳发起组织41军在乡军官会，由41军旅长、绵广师管区新兵训练处处长杨光明任会长，41军办的军官训练团少将教育长王石生任副会长，在绵阳大西街口旧工会茶馆挂了牌子，有近200人的41军退伍军官参加。这个在乡军官会经常组织人到成都找省府主席王陵基、总司令孙震请愿，要工作、要饭吃，闹得那些大官不得安宁。同时在茶馆里散布要和平、反战争、解放军公平买卖、优待俘虏的信息，起到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民心的作用。

我也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向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劝国民党绵阳县党部书记长刘鼎认清形势，多做好事。此人在以后就有所收敛。我向四川省第13行政区专员冯均逸拉过关系。因为张秀熟被捕关在巴县监狱时，冯在巴县当县长，对张的气节学问极为佩服，和张也有一定交情。我就利用这种关系，多次走访，他也请我吃过几次饭，对我有礼貌，很敬重。我们谈到共产党中不乏人才，多是爱国爱民，临危不惧的有识之士；也谈到国民党内部腐化，不可救药的情况。我向他开玩笑说："专座，你以后碰到这些有识之士，要高抬贵手啊！"确实，冯均逸在绵阳任上，治烟、治匪，办了几件大案，而对抓共产党却不太积极。这点在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是可以觉察得到的。对绵阳最后一任专员曾

继远，我以“社会贤达”的身分到专署向他讲过形势，询问如何应变，如何善其后。我隐约巧妙地对他讲过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共同纲领》。1950年他被解放军逮捕审问时，曾供述我给他讲过党的政策，是想向解放军投诚的（此人临解放时拖保安队在安县桑枣投诚，1950年被错杀，1958年已平反）。

我还利用旧关系，解放前夕向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杨俊清作过争取工作。

1944年我与孙静山（孙震独子）经营“西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我任绵阳分公司经理。当时杨俊清在绵阳任41军中将副军长、绵广师管区司令，任公司董事。他有股金和不少存款在公司里。由于这种关系，我们之间往来较多。我十分重信誉，手续清楚，以诚待人，公司业务开展得较好。杨认为我青年老成，交往较宽，也有一定的能力，对我非常敬重。他除到公司开会应酬外，也经常到公司闲谈，偶尔也与当时专员林维干、41军旅长杨光明和我打打小牌。相邀游富乐寺、渔父村、蒋琬墓。在公园喝茶时，常谈论历史，褒贬时弊，每谈及国民党腐败，无官不贪，无恶不作，蒋介石排斥异己，一意孤行，兵祸连结，拉兵征粮，民不聊生时，气愤填膺。杨多次说到：国民党不亡，蒋介石不垮，实无天理；若果共产党胜利，救民于水火，使国泰民安，杀军阀、诛恶霸，虽自己被杀，也死而无怨。听后使我感佩。我也多次把我所知的解放区的情况，共产党的政策，很谨慎地向他作一些宣传，竭力争取。

1946年春，杨俊清因孙震关系升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当时省主席张群兼司令）。据说杨到成都后，在军管区上

班较少，在家读书写字较多。

1949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是早晚之事。3月我去成都探望杨俊清，问他如何应变，今后如何打算。他说：形势已很明显，只有走为上策。我问如何走？他说：台湾不能去，蒋介石排斥异己，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必然发生，若我到台湾就不能自保，而留下又不可能，共产党的清算、斗争，岂能逃脱！再三考虑只有到香港去谋出路，暂保残生。言下十分凄然。并嘱我："千万勿向外人道，若孙德公（指孙震）知道，定会强迫我去台湾的。"因当时成都特务横行，稍不注意就会带来灾难，我也不便多说，乃匆匆告别。

1949年12月，听说孙震已逃往台湾，我想杨俊清也可能要跑了，应该作最后的争取工作，动员他联络旧部起义，走光明大道。于是匆匆赶到成都。到他家时，见屋内乱成一团，遍地书籍字画。杨告诉我好不容易避开孙的纠缠，飞机票已托人买好，三天后即可成行去香港。我请他考虑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联络旧部相机起义？他说："那怎么可能？我当军阀为虎作伥，剥削人民几十年，新都我又有田地千多亩，共产党岂能容我？"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共产党内我有不少熟人，对你的为人还是有所了解的，只要你能为人民立功，共产党的政策是立功赎罪，不咎既往的。"他说："谈何容易，我身份如此复杂，除非朱德、周恩来出面或可保全，他人岂能为力？"我见他去心已定，无可挽回，前途茫茫，后会无期，只好怅然告辞。他说，家中已无法待客，乃约我同去春熙北段"耀华"小酌，互道珍重而别。

此外，我还向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萧宋珩作过争取

工作。

1949年12月中旬，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偕其子孙静山及家属由新津机场飞逃台湾，副主任董宋珩，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41军军长张宣武等率残部逃来绵阳。董住马家巷原杨俊清公馆。一天晚上，我邀其二子董用威（当时任绵广师管区独立营营长）一道去看望董宋珩，劝他在绵阳起义。董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事已至此，不能不说真话，也只有走这条路了。但绵阳胡宗南部队云集，又有裴昌会坐镇，还有广东军队，弄不好是要吃亏的。起义是一定的，再无别路可走了。只有走着看，那里黑，那里歇。"我们谈了很久，夜深互道珍重而别（其二子董用威解放后听说在成都市工商联工作）。结果董宋珩等走到什邡率部起义。

我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所作的上述争取工作，使他们中有的人终于走上了光明的起义投诚道路，直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他们中有的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削弱对解放军负隅顽抗的势力。

三、绵阳谈判起义

1949年4月底的一天，王朴庵兴冲冲地来告诉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天堑，解放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已迁往广州。四川第13行政区保安副司令、保安大队长周式琥在成都读"成城中学"时，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当时还是活跃分子。是否可以找他来谈一下，劝他率保安队在绵阳起义。当时我感到有些为难，我想此人是实权派，手中有枪，保安队又是王陵基直接控制的反共队伍，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他见

我有些犹豫，就分析形势说，国民党彻底完蛋已成定局，蒋军已成瓮中之鳖，岌岌可危，人心思散。没有不自找门路的。周又有这段历史，说出去他也脱不了手。城下之盟，想他不敢胡来。我想这件事不仅关系我一家安危，还涉及到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安全，不能不周密考虑。我开玩笑地向王说："如果谈判不成，或者他口是心非，走后翻脸，你倒可以一走了事，而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室儿女，又如何得了？"王说："是应该往最坏处设想的，但要根据形势来全面分析考虑可能的发展变化，看来绝不至于出大问题。"

我们商谈了许久，午饭后，朴庵离去。通过彻夜不眠的反复考虑，想到形势好，有利因素多，没胆量不冒险是不能成事的。何况是党的事业，绵阳人民的安危，如果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怕什么。第二天，王朴庵一早就来了，我告诉他想定了，可以进行。他笑着说："我想你是会同意的。"我们又作了详细的研究，准备了武器，每人带一支手枪，并嘱咐我的妻张良碧看好大门，客人来后，阻止任何来访的人，安排孩子上学，准备酒菜待客。

一切安排好了，上午10点钟我去请周式琰。走到神仙街（今红星街）老邮电局（今市中区委所在地）门口就碰见了。我若无其事地问："大队长到哪儿去？有事么？"他说："没有什么事，出来随便走走。"我说："正好，孙静山、林文韬从成都来看我，在家没事想打小牌玩，三缺一，我正想约邮电局长曾介高，碰上你正好。去不去？"他听见有孙静山（孙震的儿子），十分高兴地说："去，应该去陪他们玩玩。"他就同我一道到了我家里。引他进了最里面的一间卧室，他看孙、林不在，感到有些诧异，我忙解释说：

"他们在那边房间里闲谈，先坐坐，他们就来。"我一边泡茶，一边敬烟，并感叹地说："打小牌也是混心焦，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前途堪忧，谁还坐得住！军政大员都在各找出路，孙总座（孙震）准备飞台湾，杨俊公（杨俊清）即将去香港，我们这些人又将如何应变？大队长你的打算，有何高见？"这也是当时一般军政人员谈论的主要话题。因此，他没感到突然，恰好也说中了他的心病。他思考了一下反问我："经理（我当时是西南公司的经理），你是如何考虑的？怎么办为好？"我说："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不甘心给大人物作陪葬。跑是没有地方，留下来作点稳定秩序、安定民心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是可以立功赎罪的，立大功还可以受奖呢！我想请教你，可不可以共同为绵阳的和平解放立点功劳？你大队长是有这个力量的。"周听后有点激动，想了一下，才谨慎小心地说："莫要乱说，别人听见会出问题！我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守是守不住的，抵抗只有完蛋！为绵阳和平解放立点功劳何尝不是办法，但共产党是否相信我们，是否能保住我们身家性命？并且胡宗南、裴昌会的大军云集这一带，如何立功？谈何容易！只有走，哪里黑，哪里歇。"我又说："胡宗南、裴昌会已是釜底游鱼，何能自保？不降即逃，逃是逃不脱的，也绝不会有出路。你我罪恶不大，犯不着给别人去殉葬。"周慨叹道："我何尝不想另找出路，但谁能相信我们？风险太大，不可轻举妄动。"我马上说："怕什么，事到临头须放胆，只要你有决心走起义的路，一定是会有出路的，你也会得到信任的。可先秘密地找通共产党的人接头试一试。据我所知，我们四川的军政人员与中共有联系的人不

少。”周说：“谈何容易，除非你杨经理是共产党，就好办了。”我说：“我虽不是，但我可以找到共产党来和你会面。”这时王朴庵突然走了进来，我一面让坐，一面就开门见山地给他介绍说：“这是中共代表汪同志，这是保安大队长周式琰先生。”周大惊失色，立坐不安，朴庵则神态自若，笑着说：“久仰，久仰。说来也不是外人，大队长在成都读成城中学时，不是很进步的么？”随后他给周分析形势，并劝县率队在绵阳起义，为人民立功。他还详细讲了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最后严肃地对周说：“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生路，向人民投降的光明大道；一条是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你现在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王的语气十分强硬。我心想，周万一恼羞成怒，则很难处理，但我又不好插话，多次不自觉地摸摸衣袖中的手枪。周则低头不语，诺诺连声，迟疑甚久，后来表示愿意向人民投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紧张气氛稍趋缓和。王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能弃暗投明，我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王又询问了保安队的情况及政府应变的措施，并说：“你今后受云涛领导，应经常与云涛联系汇报情况。”谈了一个多钟头，我就请他们吃饭，我也对周敬酒表示祝贺，周则极不自然，食难下咽，食后匆匆告别。周走后，我催朴庵也赶快离开我家，并请他一周内不要到我家来，以防意外。他反安慰我不要顾虑，不会有什么问题。

此后，周与我见过几次面。一月后朴庵找我，邀周式琰在东门河堤上见面，询问绵阳的情况。以后周也主动来找过我，汇报专署及县府的应变措施；改编保安队及警察队，精

简人员，必要时放弃绵阳，向安县、北川撤退，保持掌握部分武装自卫，看局势发展，再作进一步的安排。他还说，为了保障人民不受散兵游勇骚扰，各重要街口，要修坚固的栅门，定时早开晚闭，设警把守，防止散兵游勇进入。要加强消防设施，把太平池、太平缸注满清水；水枪水龙、消防桶要检修造册登记，发给各保甲长及消防队掌握使用。必要时打开监狱及看守所，对已决未决人犯一律释放。周并告诉我，这些措施是他有计划地提议办理的。自然，这对保护绵阳不受骚扰破坏，能起一些作用。所以，当时我对周也加以鼓励。

1949年12月上旬的一天，周式琰突然来找我说："情况万分紧急，曾专员命令他带全部保安队随同专署人员立即向安县撤退。"我说："一定不能走，必须守住绵阳迎接解放。"他说："胡宗南大部队云集绵阳，裴昌会坐镇防范极严，几个保安队如何敢在绵阳起义。"我想了片刻说："不然，我和你一道把保安队拖过北河，翻山向沉香铺、抗香铺一带躲避，并相机解决国民党的一些小部队，以迎接解放军。看来解放军进展迅速，绵阳解放也是很快的。要镇定，要大胆，要有信心。"他见我言辞坚决，未能多说，只是说他再想一下，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就走了。以后他没有来找我，我也不好去找他，只听人说他带家眷、财物、保安队，随专员曾继远向安县跑了。

绵阳解放不久，1950年1月上旬，我和李英商量，还是尽力想把他争取回来。李英用王朴庵和我的名义向他写了一封很诚恳的劝说信，既往不咎，请他回来。派人送去，周没回信，大概是2月初，周突然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们已向

解放军投降，请我证明他曾经和我们谈判过，并接受党的领导等等。我把信拿去找李英研究，李说他并没按照我们的指示办，也未做出立功表现，不必管。我就没给他回信，以后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四、智取绝密情报

1949年初，胡宗南部由陕西进驻三台、盐亭、中江等县。省主席王陵基电令在川西北各县征调民夫万余人，组成民夫队（以后又称“铁肩队”）为胡宗南作军事运输。4月胡宗南大部队向四川移动。省府又电令昭化、广元、阆中、盐亭、三台、巴中等县沿途供应粮秣。在绵阳等地，许多胡部军官眷属抢住民房，抢购黄金、粮食，闹得人心惶惶。不久蒋介石便委派胡宗南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以后又在绵阳设绥靖公署绵阳分署，以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为主任，王元辉（四川省保安司令）、林树恩为副主任。在这段时间里，胡宗南及其参谋长罗列、办事处主任余达等人经常往来成都、绵阳、重庆，商筹军务。大概是8月下旬，胡宗南在绵阳文庙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第13、14行政区专员及其辖区各县县长都列席了会议，省里也来了不少要人。官盖云集，警戒森严。当时没有招待所，好一点的旅馆也很少，来宾自找住处，多住在军营或亲友之家。

安县县长李叔尧住在我邻居绵广帅管区军需处长金汝碱家里。他们有旧，关系很好。金也常请我作陪打小牌，一起吃饭。我也想了解一些情况，有时主动找金、李谈谈。我也把知道的情况向王朴庵汇报。他嫌不够具体，希望能得到会上的

文件看看。我对金家的情况很熟悉，平常家中只有妻子一人。她体弱多病，行动迟缓；另有个小女名金仲芳，在读小学，还有一个老仆人不大管事。而李叔光的住房及放文件的衣柜是不上锁的，容易取到文件。我就利用金和李出去赴宴的机会，去金家找金妻（老太婆）闲谈，乘她给我泡茶时，我巧妙地取到了文件，并迅速送给王朴庵（事先约好王在我家等候），王从容不迫地翻阅并摘抄，我则心急如焚，怕时间久了送不回去。花了一个多钟头勉强抄完了，我又巧妙地退回原处，才如释重负。我问王朴庵关于文件的内容，他说，内容很重要，是传达蒋介石的指示，加强征粮征兵，肃清土共，以四川为最后据点，必须坚持死守；万一不行，则向滇、缅、越南边境撤退，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美援，即行反扑；最重要的是研究大巴山设防堵截解放军问题，速即完成万源、镇巴段公路；加紧抽调民夫作军事运输；以裴昌会的5兵团，李振的18兵团共14个军驻守；川西北各县要积极做好支援工作等等。

地下党掌握敌人高级军事会议部署的这些绝密情报，对于解放军胜利入川，解放四川，解放大西南，的确是有益的。

五、动摇“巴山防务”

1949年9月的一天，住入绵阳树德小学的邻居、裴昌会的副官李贞，邀我陪他的老朋友胡部110师的副师长林维周（师长是雷鸣，部队驻守城口、万源一带，是大巴山设防重要武力，属罗广文的部队）打牌吃饭。林到成都找蒋介石、胡宗南领取全师应发应补的军费，经过绵阳来看望裴昌会和

李贞的。记得被邀请的还有“联勤总部第7补给站（属军政部直接管辖）的上校站长杨诚和邻居金汝铖。闲谈之下知道林已领到的军费不少，又多是金条银元。我灵机一动说，“有这么多钱，可惜时间不行，林师长又要很快赶回大巴山设防，否则可以利用这些钱做两次转手生意，不费力气就可以大捞一笔外快。”当时杨诚也称赞我做生意是一把好手（因为杨诚曾通过我介绍了一些绵阳商人，做过几笔生意，收获不小），打牌和席间我尽量散布悲观情绪，说国民党军事接连失败，人心不稳，前途堪忧，而我辈应变无计，出路也不好找。又谈到41军副军长杨俊清就想逃到香港去开办旅馆一事。我再三谈到若有一笔资金，不问国事，逃出是非地，带上家人子女，到国外去当寓公，则不失为良策。

这人在绵阳住了几天，几乎每天到李家作客，我也随时去找林闲谈，散布“有钱万事足”的观点，以动摇他的信念。半个月过去了，一天李贞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林师长偕同家属把他领到的经费全部带上跑了。我问跑到哪里去了，李答听说在成都弄的飞机票，跑到香港去了。同时说，驻守大巴山的110师部队没有军饷，军心动摇。我则十分庆幸。事后，我曾向王朴庵同志汇报过此事。